

董仲舒

研究

周桂钿 著

唐学系列讲义
主编：周桂钿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
儒学系列讲义
主编：周桂钊

董仲舒研究

周桂钊
著



人
民
大
学
社

责任编辑:方国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董仲舒研究/周桂钿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

(儒学系列讲义)

ISBN 978-7-01-010950-3

I. ①董… II. ①周… III. ①董仲舒(前179~前104)-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234.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20553号

董 仲 舒 研 究

DONGZHONGSHU YANJIU

周 桂 钿 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4.75

字数:198千字 印数:0,001-3,000册

ISBN 978-7-01-010950-3 定价:36.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总 序

周 桂 钊

1994年10月5日在北京二十一世纪饭店成立的国际儒学联合会,是由中国、韩国、日本、美国、德国、新加坡、越南等国家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儒学研究团体共同发起成立的。会长是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先生。国际儒学联合会的宗旨是“研究儒学思想,继承儒学精华,发扬儒学精神,以促进人类之自由平等、和平发展与繁荣”。同时,为世界儒学研究学者搭建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

10年后,2004年,谷牧会长年事已高,辞去会长职务,任名誉会长。全国政协原常务副主席叶选平先生担任第二任会长,原轻工业部部长杨波先生与原文化部部长刘忠德先生担任常务副会长。下设秘书处、学术委员会、编辑出版委员会,后又增设儒学普及委员会。后因健康原因,刘忠德先生不再担任常务副会长,由原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滕文生任常务副会长,杨波先生任副会长,赵毅武任常务副理事长,钱逊先生任副理事长。

赵毅武先生重视办学培养人才,愿意出资1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创办儒学院。刘忠德先生曾任大学校长、国家教委副主任,对办学有经验,也有兴趣,但认为自己办学难度很大,建议与大学合作。联系几所大学以后,中国政法大学徐显明校长对办国际儒学

院有积极性,一拍即合。经过几个月的协商,决定成立国际儒学院。中国政法大学提供硬件(办公室与教室),国际儒学院负责师资与经费。经费由赵毅武先生捐助。中国政法大学方面校长助理、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王卫国先生参加了筹备的全过程。国际儒学院是中国政法大学二级学院,院长是刘忠德先生。儒学院要办成“儒学特区”,作为学会与大学联合办学,进行儒学教育的试点。我们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先行者、探索者、实践者开始工作。后徐显明先生调任山东大学校长,黄进先生从武汉调来中国政法大学担任校长。黄进先生对儒学比较熟悉,也有热心,使国际儒学院可以继续顺利办下去,也使我们对国际儒学院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如何培养儒学研究者和传播者?不能只靠听课读教材。既要提倡读儒学经典,深入思考,开展课堂讨论,也要请国内外儒学研究专家开讲座。还有两项重大改革:一是教学与学术活动相结合。除了听课,尽可能多地参加关于儒学的学术活动。最重要的是参加国际儒学联合会(简称儒联)的活动,因为儒联是合作创办单位,也是领导单位。2009年儒联召开国际大会,儒学院的研究生全部参加服务工作,让他们有机会与全世界著名的儒学研究专家接触,有机会听到他们的高见。北京国子监孔庙是儒学教育基地,儒学院的研究生们经常参加那里的祭孔、敬老、尊师等各种活动。在北京各高校召开的与儒学有关的学术会议,也让研究生尽可能去旁听。山东泗水尼山书院开展会讲活动,儒学院的研究生们多次积极参与,收获很大。教师到外地参加学术会议,回来后也向同学们介绍会议情况。二是“为己之学”。儒学的特点在修身。学儒学首先强调修身,就是要用儒家精神,培养自己的人格,提高自己的素质,将儒学的优点变成自己的思想与行动。这是“知行合一”。要

努力避免“为人之学”，只能跟别人讲儒学的知识，自己不能践行儒学精神，不能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

2006年10月21日，国际儒学院召开理事会暨院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国际儒学院的办学与其他各项工作。教师多数是从北京各高校与研究机构聘请的对儒学有深入研究的专家来担任，第一批兼职教授11位，他们负责授课与指导研究生。他们的职称都是教授，多数是博士生导师。2007年招收第一届研究生，现已招收六届，毕业三届。课堂不采取“满堂灌”的单向灌输方式，而采取讨论交流的形式，注重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会学习与研究，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与习惯。也请学生对授课教师进行评估，并有评语。我们从教学效果较好的课程中选择部分讲义，作为国际儒学院的《儒学系列讲义》出版。任课教师将讲义重作修订，又请同行专家评审，再参考学生与教师的意见进行修改。经反复修改，最后定稿。这一系列讲义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儒家经典课程，如《论语》、《孟子》、《春秋》、《礼记》、《大学》与《中庸》等；二是儒学史课程，如“中国儒学概论”、“先秦儒学史”、“经学与玄学”、“理学与心学”、“中国儒学研究方法论”以及儒学专题如“简帛中的儒学”等；三是儒家课程，如“孔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冯友兰”等。现在出版第一批《儒学系列讲义》共6本：赵伯雄的《〈春秋〉经传讲义》、钱逊的《〈论语〉讲义》、陈昇的《〈孟子〉讲义》、陈战国的《先秦儒学史》、林存光的《孔子新论》、周桂钿的《董仲舒研究》。这些讲义都是教师研究儒学的重要成果，再用通俗的语言向学生讲授，最终形成讲义。这些讲义都是比较严谨的、有创新性的，又是比较通俗的，但不能说没有错误。因此，欢迎读者批评指正！以后我们还将陆续出版其他讲义。

自序

一、研究董仲舒缘起

我于1964年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1966年参加“文化大革命”，1970年下乡插队。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钟肇鹏先生，学习中国哲学史。开始研究王充哲学。学术界有人认为王充哲学与董仲舒哲学是针锋相对的，于是，我在研究王充哲学，出版《王充哲学思想新探》以后，就着手研究董仲舒哲学。1985年，这项研究获得美国王安研究院汉学研究奖助金，这项研究得到一种助力。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集中精力，研究几年，交出初稿，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89年1月出版，书名《董学探微》，32.6万字。该书出版后曾获全国高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优秀奖、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而后又经常写些论文来加以发展，这就组成《董学探微》（增订本），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5月出版，增加十多万字，达到47.1万字。2009年下半年，我给国际儒学院讲授“董仲舒哲学研究”课程，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整理出一本讲义来。本书就是这个讲义修订本。

二、研究历程：三次定性董学

我研究王充之后，就开始着手研究董仲舒的哲学。我在研究董仲舒哲学的过程中，给董仲舒哲学的定性产生过多次改变，主要的就是三

次定性董学。定性的变化,说明研究的深入,思想的提高。

第一次定性:研究王充哲学时,给董仲舒哲学定性为唯心主义。学术界关于王充与董仲舒关系的论著,都是说董仲舒提倡天人感应,王充反对天人感应,因此,他们是针锋相对的。这多是人云亦云,没有认真细读《春秋繁露》与《论衡》,更没有全面深入地研究王充与董仲舒的思想。王充批评的天人感应多是儒家经传中或其他论著中的说法,涉及董仲舒的只有“土龙致雨”一节,其他多是肯定的、赞扬的。我研究王充哲学的时候,还时常将董仲舒天人感应说作为王充反对天人感应说的对立面,摆在唯心主义地位上。根据王充《论衡》中62次提到董仲舒,看不出王充与董仲舒针锋相对,却看到王充对董仲舒的高度赞扬,即使是批评,也是比较客气的。

第二次定性:研究董仲舒哲学时,给董学定性为形式是唯心的,内容是唯物的。1985年,通过张岱年先生、钟肇鹏先生和任家麟先生的推荐,我获得美国王安研究院汉学奖助金。获得这项首届奖助金,中国大陆有11人,北京师范大学有林崇德先生和我。我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又用两年时间专心研究董仲舒思想。首先通读《春秋繁露》,研究董仲舒哲学;其次翻阅过去发表的关于董仲舒的论文,还请我的研究生同学又是好朋友的张永明同志到北京图书馆给我复印一些资料;最后在综合古今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研究,写成《董学探微》。启功先生题签,张岱年先生写序,河北枣强县文化馆馆长步进同志提供董仲舒石像照片,都为本书增色不少。本书对董仲舒生平事迹做一考证,主要考证他的出生之年和故里、对策之年与任相经历。此书出版后,学术界也有一些不同的议论,但没见特别有力的反证。倒是有一位外国女学者汉名桂思卓向我提出让我震惊的意见。她说董仲舒的菜园可能不在他的老家故里景县,似乎应该在京都长安。理由是:五十多岁的董仲舒已经是景帝时代的博士,怎么能还在家乡?我深感她看书认真,思考仔细。后来我再研究一番,觉得董仲舒的菜园在长安更合理一些。专门写了一篇自我批评的文章《董子

菜园在何处》发表在《学术界》2003年第6期上。董仲舒哲学是从当时社会现实出发,最后还是归结到社会现实。他的哲学体系用天人感应形式来论述,内容是为当时的社会政治服务的,有明确的针对性。因此,我用了“形式是唯心的,内容是唯物的”来定性董仲舒哲学。虽然仍然肯定董仲舒哲学是唯心主义的,也像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黑格尔哲学的评价那样,肯定他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包含唯物主义的成分和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但还是没有脱离用两个对子来研究中国哲学的旧理路,尽管在研究过程中尽量使用中国哲学原有的概念和范畴。

《董学探微》认为,董仲舒哲学是以“大一统论”为中心,以“天人感应”和“独尊儒术”为重要两翼,充分肯定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辩证法思想,不赞成根据“天不变道亦不变”一句话就将它定性为“形而上学”。

在《董学探微》出版之前,我参加钟师肇鹏先生主持的《春秋繁露》校释工作。在校释中,获得很多儒家典籍资料整理的知识和经验。这对研究董仲舒思想有很大帮助。

从中国思想史上看,对中国社会政治整体影响最大的特级思想家只有三位:一是孔子,他的影响无与伦比。其次是董仲舒,他提出“独尊儒术”,奠定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同时强化了中华民族凝聚力、认同感和联系情感的纽带。他提出的“天人感应”论,直至明清时代还有天坛,皇帝每年正月上辛日还要恭恭敬敬地到天坛祭天,祈求上天赐予“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他提出的“大一统”论,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对维持中国大国统一的政治局面有重大影响。再一位就是朱熹,他的理学发展了儒学,他的《四书集注》成为封建后期八百多年知识分子必读书。在两千五百年中,孔子影响了两千五百年,董仲舒影响了从汉朝到清朝的两千多年,朱熹影响了最后八百年。他们的思想还在影响着中国与世界。

第三次定性:是在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以后,发现中国传统哲学主流是研究政治哲学。董仲舒哲学就是典型代表。在研究了王充哲学

与董仲舒哲学的基础上,研究了汉代的天文学与医学,也研究了汉代的经济学与史学,还研究了汉代许多思想家,包括王莽等人。最后汇编成《秦汉思想史》。在很多人讨论中西文化差异的时候,在讨论中国有没有哲学的时候,在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时候,都让我感到困惑,百思不得其解。徐复观先生的一本书《中国艺术精神》启发了我。他认为庄子的道就是中国艺术精神,修道就是培养艺术精神。王充是近代科学精神的超前觉醒者,是求真的科学哲学;庄子是求美的艺术哲学,那么董仲舒与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这些主流派哲学家,就都是求善的政治哲学家。这样,我就把哲学分为三大类:求真的科学哲学、求善的政治哲学与求美的艺术哲学。这就是我第三次将董仲舒哲学定性为求善的政治哲学。科学哲学探讨宇宙本原,因此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政治哲学探讨的是社会治乱问题,只有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开放与封闭的区别,不存在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董仲舒哲学是求善的政治哲学,因此不能用唯心主义来定性。秦汉时代是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封建制度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制度,地主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董仲舒哲学代表地主阶级,为封建制度服务,也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过去对董仲舒哲学的批评,多是由于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也缺乏历史辩证法的思维能力。第三次定性是在我研究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才作出的,那是在我世纪之交的重要研究成果。

学者改变自己以前的观点,有的迫于形势的压力,有的出于利益的考虑,更多的是由于认识的提高,思想的进步。认识的提高,思想的进步,都是有根据的、有原因的、有线索可寻的。这是可信的、正常的。勇于修正自己的观点,是应该提倡的。

三、研究董仲舒的体会

我从1979年开始研究董仲舒,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我有很多

感想。

第一,我将董仲舒与孔子、朱熹并列为中国历史上对全社会影响最大的三大思想家。孔子是儒学创始人,董仲舒是经学大师、汉代新儒学的代表,朱熹是理学大师、宋代新儒学的代表。以后虽然也还有一些大师如元代的吴澄、明代的王阳明、黄宗羲、王船山等,影响都不及前三者久远广大。孔子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而董仲舒承前启后,起了关键的作用。孔子儒家在先秦只是百家中的一家,虽是显学,却没有独尊的地位。从汉代开始升到独尊的地位,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主干。李英华于2009年6月17日下午在德州召开的董子文化研讨会上提出要增加周公。周公确实是大思想家,因为材料不足,胡适写《中国哲学史大纲》,毛泽东讲中国传统文化,都从孔子讲起,可能也是这个原因。

第二,董仲舒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三项:“大一统”论、“天人感应”说与“独尊儒术”。此前虽有统一的思想,如周代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谷风之什》)以及春秋时代的五霸都以尊周为口号,战国时代不再尊周,各国也都想统一天下。诸子百家也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统一天下的愿望,如墨家的“尚同”思想。秦始皇用实力统一了天下,要将思想统一于法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由于“一断于法”的片面性,秦朝很快灭亡了,这也就宣告了失败。汉人总结秦亡教训,以为是好大喜功,于是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了战国时期黄老的“无为之治”。中央无为,诸侯覬覦。贾谊提出警告,没有人相信,汉文帝也下不了决心。几十年后,终于爆发吴楚七国之乱,晁错不幸冤死。如果说秦朝好大喜功,偏“左”,那么汉初无为之治,则过右。为了大一统,一方面要“屈民而伸君”,主要指诸侯王要服从皇帝;另一方面要“屈君而伸天”,给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加上“天”这副精神枷锁。这就演绎出天人感应理论。天是什么?需要儒家进行解释,儒家当然按儒学来解释,于是天就变成了儒学的代表。皇帝要敬天,自然就要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与“独尊儒术”都

是为政治哲学服务的,或者说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构成因素。汉朝以前,虽然有许多大一统的思想,真正提出大一统理论并在实际上维护大一统的还是董仲舒。汉以后,国家统一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为统一而奋斗的就是民族英雄,破坏统一搞分裂的就是民族败类、卖国贼。这就成为民族共识。宋代诗人陆游在弥留之际,仍然惦记着国家的统一。“死去元(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此诗为后人长久传诵。

第三,哲学按三类分法,董仲舒哲学属于求善的政治哲学。过去根据董仲舒讲天人感应,说他是神学目的论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我认为,董仲舒不探讨宇宙本原问题,只研究社会治理问题,是政治哲学,不属于宇宙论哲学中的唯心主义。董仲舒虽讲“天不变,道亦不变”,但在《春秋繁露》中可以看到他的许多说法是富有辩证法的。他借用《春秋》与阴阳五行理论,阐发自己的政治哲学。同时也融会先秦诸子百家的优秀成果,根据汉代的社会实际,构建适应汉代社会的儒学体系。因此,董仲舒哲学体系具有综合创新的意义。孟子说孔子是集大成者,董仲舒同样也是集大成者。孔子、董仲舒、朱熹都是求善的政治哲学家。

第四,研究董仲舒思想要摆脱疑古思潮的影响。在疑古思潮影响下,中国古籍几乎都不可信,随便找一点理由,便轻易加以否定。例如有人根据《史记》没有记载天人三策,就说天人三策是班固伪造的。董仲舒三策与汉武帝策问相联系,班固敢伪造汉武帝的策问吗?有的人说《春秋繁露》不是董仲舒的著作,而是后人伪造的。理由是汉代没有这个书名,后代才有。汉代也没有《史记》,只有《太史公书》,难道《史记》也不是司马迁所著,而是后人伪造的?这种怀疑充塞台湾学者的著作中,由此影响到日本以及西方各国学者。这是需要纠正的。我们对经典要有崇敬的心态。席泽宗院士回忆,他的老师叶企孙对他说:“写文章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篇文章30年以后还站得住,才算过硬。”如果一本书300年以后还站得住呢?那一定是文化精品!3000

年后还站得住呢？那就是经典！我们读经典著作的时候，要怀着崇敬的心态，同情的理解，采取学习的态度，而不是轻蔑的心态，挑刺的眼光，否定的观念。如果不是要继承什么优秀成果，那我们为什么要读它呢？有的说“二十四史”都是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的，都是文化垃圾，应该抛入历史垃圾堆。我问他看过“二十四史”没有，他说没有。这说明忽视历史是无知的表现。杜甫有诗句曰：“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轻蔑古籍的人都在历史中被淘汰了，古籍仍然不断流传下去。谈儒色变，是从五四到“文化大革命”批儒积弊的后遗症。有一些人蔑视古人经典，一味地“创新”，经过炒作，有时也会产生轰动效应，时髦一时。这些都只能是速生速灭的文化垃圾，不到30年，就都被淘汰了。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查30年以前发表的东西，看还有多少东西还站得住。

读书要有“皓首穷经”的精神。古籍流传久远，由于时代的变迁，读起来不容易理解。如果不能细心阅读，深入思考，那就难以领会其中深意。正如司马迁所说：“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汉代有些人读儒家的书，头发白了才弄懂一本经书。我们现在不必那样，但是还需要这种深入钻研的精神。有一个青年学者花了6年时间埋头读《周易》经传，写出两本专著，都获得全国性大奖。另一青年学者花6年时间细读《全宋文》，也写出两本获奖的专著。还有学者也是花6年时间潜心研究，写出颇有影响的大部头专著，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也有一些人急功近利，想走捷径，下载资料，拼凑文章，四方活动，拉关系，走门子，忙碌10年，却写不出高水平的论文，这叫“欲速则不达”。投机取巧，自作聪明，最后，“聪明反被聪明误”。书要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谁也代替不了，什么条件也改变不了。有钱可以雇人扫地，不能雇人代替读书。学问是积累的，不断读书，是积累的过程。不断思考，也是积累的过程。做学问是细水长流，厚积薄发。

第五，富而后教正当时。《论语·子路篇》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

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段记载的大意是:孔子到卫国去,他的弟子冉有为他赶车。孔子说:“人真多呀!”冉有问:“人已经很多了,又该怎么办?”孔子说:“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已经富裕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对他们进行教化。”后人对这段话归纳为“富而后教”,是孔子儒学的重要思想。富以后,如果不进行教育,那就会坠落、腐败。君子富起来后,不能骄傲,“富而无骄”,还要“富而好礼”。如果富裕了,不能及时给予教育,新富起来而又缺乏教育的人容易骄横为暴,严重危害社会。按孟子的说法,这种人就跟禽兽差不多:“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

综合起来,汉初的60年,正好是孔子所说的三个阶段:先建立健全的社会秩序,人口增加,安居乐业;让人民富起来;对他们进行教育。按现代的说法,就是安定社会、发展经济、提高文化。汉初60年发展历程,是否有规律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也有过社会安定、物质富裕和精神文明三个阶段。现在正是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精神文明的时代,各地党政领导努力发掘本地的文化资源,恢复古迹,重修庙宇,创办书院,发展文化事业,建设人文景观,符合中央精神,符合人民愿望,是顺天应人的善举,值得赞扬。这才能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个新文化的发展,造成一种文化氛围,让群众在这样文化氛围中潜移默化,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如何构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大家都在实践中探索。当然,发展文化事业,还要注意量力而行,保护旧的,创建新的,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转到“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大力提高群众的文化素养,增加民族凝聚力,发展国家的软实力,为世界和平事业多做贡献。

目 录

自 序	/ 1
第一讲 董仲舒传记资料考证	/ 1
一、董仲舒生平 / 1	
二、董仲舒生年考 / 4	
三、董仲舒对策考 / 7	
第二讲 董仲舒对策主要内容	/ 11
一、汉武帝关心的问题 / 11	
二、董仲舒的解答 / 13	
三、董仲舒的建议 / 16	
第三讲 《春秋繁露》选读一《竹林》	/ 24
一、《春秋》之常辞也 / 24	
二、其书征伐甚谨 / 26	
三、齐顷公亲齐桓公之孙 / 27	
四、逢丑父杀其身以生其君 / 29	
第四讲 《春秋繁露》选读二《精华》	/ 32
一、《春秋》之法,大夫无遂事 / 32	
二、齐桓公仗贤相之能 / 33	
三、《春秋》之听狱也 / 36	

四、古之人有言曰 / 37

第五讲 《春秋繁露》选读三《王道》 / 39

一、桀纣皆圣王之后 / 39

二、《春秋》立义 / 41

三、诸侯来朝者得褒 / 44

四、《春秋》之义 / 46

第六讲 董仲舒人性论 / 49

一、性未善论 / 49

二、性三品四品和性情说 / 56

第七讲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 / 59

一、借圣人讲灾异谴告说 / 59

二、借天讲儒学 / 61

三、利用同类相应论证“天人感应” / 63

第八讲 董仲舒的“天”与《圣经》中的“上帝” / 70

一、董仲舒讲的“天” / 70

二、董仲舒论证“天人感应” / 73

三、董仲舒的“天”与《圣经》中的“上帝” / 83

第九讲 董仲舒独尊儒术 / 89

一、政治家与哲学家的联盟 / 89

二、秦始皇为什么焚书坑儒 / 91

三、儒学创新,与时俱进 / 92

四、独尊儒术以后 / 96

五、如何评论历史上的统治阶级 / 98

六、汉武帝分别对待当时大儒 / 100

七、独尊儒术在《史记》中的反映 / 104

八、独尊儒术反映在选用人才上	/ 107	○
九、汉代新儒学的启示	/ 110	
第十讲 董仲舒大一统论	 / 111	
一、大一统观念	/ 112	
二、大一统理论的确立	/ 113	
三、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与思维方式	/ 116	○
四、天子是大一统政治的核心	/ 120	3
第十一讲 董仲舒仁义论	 / 127	
一、仁远而愈贤	/ 127	
二、宜在我为义	/ 130	
三、新的仁义观	/ 131	
第十二讲 董仲舒义利论	 / 134	
一、义利新说	/ 134	
二、义利释疑	/ 137	
第十三讲 董仲舒名讳论	 / 144	
一、名号说	/ 144	
二、名讳论	/ 148	
三、名讳论的影响	/ 149	
四、名讳论的流弊	/ 151	
五、名讳论的历史地位	/ 152	
第十四讲 董仲舒辞指论	 / 153	
一、辞与指	/ 153	
二、董仲舒辞指论	/ 154	